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学出版与新文学教学的发展（1918-1923）

朱丽娜
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100871
DOI: 10.61369/RTED.2026130035

摘　　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化的中国大学诞生。伴随着高等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创立，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大学出版机构随中国大学起步，在各种文学文化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以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出版部的自编教学讲义与新文学出版工作为例，重点阐述大学出版机构与新文学教学之间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突破传统文学史单纯聚焦“报纸期刊”与“社会思潮”的局限，引入“新文学知识体系”与“学科建制化”的视角，深入剖析北京大学出版部如何通过印行先锋讲义，确立现代人文学科的教学范式。研究发现，非营利属性的大学出版充当了新学科的“学术孵化器”，其独特运作模式成功推动了新式教科书的“中国化”与“经典化”。这一历史进程不仅保障了新文学在教育体制内的合法性，更在此过程中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主体性与知识话语权。

关 键 词： 新文化运动；大学出版；新文学；北京大学出版部；学科建制化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Publishing and New Literature Teaching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1918-1923)

Zhu L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ies came into being. Along with the modern establishmen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mechanis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University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start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literary and cultural movements. Taking the self-compiled teaching handouts and new literature publishing work of the Publishing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ound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mmon development between university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and new literature teaching.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history that merely focuses o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nd "social trends of thought", this research introduces the perspectives of "new literature knowledge system" and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how the Publishing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established the teaching paradigm of modern humanities by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pioneering handou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non-profit university publishing acted as an "academic incubator" for new disciplines, and its unique operation mode successfully promoted the "Siniciz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new textbooks.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not only guaranteed the legitimacy of new literature within the education system, but also established the subjectivity and knowledge discourse power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a in the process.

Keywords: New Culture Movement; university publishing; new literature; Publishing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alization

一、新文化运动与北京大学出版部的创立

大学出版社作为一种学术出版机构，诞生于欧洲。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印刷所早早确立了大学出版的学术权威。我国的大学出版，一般可追溯到1862年洋务派创建的京师同文馆。同文馆设立的初衷是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除西学教学外，还进行翻译和出版活动。从1862年创办起至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期间，翻译出版了众多经典译作，如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汪凤藻翻译、丁韪良鉴定的《富国策》等，为传播西方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1]。同文馆于1873年开办印刷所，之后设负责译本编校的纂修官，此时已具备高等教育出版机构的雏形。

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京师同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文馆随之并入。创立之初，光绪下谕批准设置译书局，后加设编书处[2]。译书局和编书处延续了同文馆的翻译和出版功能，并根据现代学科分类将所译教科书内容分地舆、西方律令、代数等38类[3]。然而，晚清至民国初年的高校出版，其核心驱动力始终是被动译介，缺乏中国学者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自觉建构。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在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1918年该机构正式重组并改名为北京大学出版部。这一更名并非简单的行政翻牌，而是中国大学出版向“现代学术出版阵地”跨越的历史性标志。

（一）新文化运动和北京大学的学术生态

以往的史学叙事中，新文化运动常被描绘为一场依托《新青年》等期刊发起的社会思想狂飙。然而，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要真正重塑下一代国民的精神底色，不能仅仅停留在杂志的散论和口号中，它必须进入体制内的教育体系，转化为系统化的学科知识。

1917年蔡元培被聘任北大校长后，提出“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提倡学术自由的学术风气。他破格聘任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一大批致力于宣传新思想的新文化人士担任北大教授。至此，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阵地。新派学者走上讲台，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便是“无书可教”的教材荒。这直接倒逼了北京大学出版部出书模式的变革。

（二）北京大学出版部与“同人共治”的架构

1917年蔡元培聘请李辛白担任北大庶务主任。一年后李辛白改任北大出版部主任，负责出版发行工作。李辛白曾于1908年创办《白话日报》，被胡适推崇为推广白话文的“开山老祖”。由这样先驱实干家执掌出版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该机构亲近新文化、支持新文学的发展基调。

为了从顶层设计上保障出版物的学术水准，北大出版委员会在出版部成立后一年设立。出版部是学校业务执行机构，出版委员会则是学校行政决策机构的组成部分，对出版部进行工作指导。北京大学出版委员会委员长为胡适，委员有：李辛白、张相文、钱玄同、陶履恭、王星拱、张大椿、陈衡哲[4]。其成员几乎清一色是《新青年》的核心同人或新文化运动的健将。

二、化解“教材荒”：新文学自编教学讲义的出版

“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在文学方面的体现，此时的文学概念较为宏观，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等狭义的文学体裁更迭，更意味着建立在白话文和科学理性基础上的新知识体系。

当时的教学用书主要以翻译和购买国外图书为主，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出版部成立。出版部成立之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自编教科书之路。

查阅登记于1920年前后北京大学出版部的出版书目，在选录的134本出版物中，与新文化、新文学相关的图书就有60余种，占比有一半之多。其中教授们自编的新文学讲义有近30种，且绝大多数都是现代高等教育各专业学科领域的首部著作。

表1-1 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新文学相关讲义部分节选[5]

书名	作者	出版时间	学科开创意义
《欧洲文学史》	周作人	1917-1918	国人编撰的首部西方文学史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	1917-1918	中国哲学现代学科建立标志
《文字学音篇》	钱玄同	1918	最早的现代汉语音韵学教科书
《中国文法通论》	刘半农	1918	现代汉语语法建设觉醒标志
《心理学大纲》	陈大齐	1918	中国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科书
《印度哲学概论》	梁漱溟	1919	学院派东方哲学研究先河
《西洋伦理学史》	杨昌济	1919	现代伦理学学科体系构建
《新闻学》	徐宝璜	1919	中国最早的新闻学专著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1920	小说史学与文体革命的开创

三、从启蒙思想到现代学科：自编讲义与人文学科的创立与发展

大学出版机构区别于民营出版机构的突出特点在于，嵌入了大学的教学活动中，成为学科建制化的先锋阵地。新文学的观念要沉淀为长久的学术传统，必须通过“教材化”来确立自身的知识边界，教授们在编写新式教学讲义时开创了多个“中国首次”。

（一）确立主体话语：周作人与《欧洲文学史》

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是中国第一本西方文学史，现代高校中的“外国文学”课程由此正式确立。在此之前，北大涉及外国文学的课程仅有辜鸿铭用文言文讲授的“英文诗”课程，带有浓厚的旧派文人赏玩色彩。《欧洲文学史》从希腊文学开篇，随后是罗马、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最后以十七十八世纪文学结束。周作人在编纂这本讲义时，并非单纯的客观知识搬运，而是深刻注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内核。他巧妙地摒弃了中国传统文学史观中“文以载道”的封建道德约束，将西方“人本主义”确立为评判文学价值的最高标准，这与其在《人的文学》中所倡导的理念形成了严密的逻辑互文。在毫无前人经验可循的拓荒期，周作人白天起草稿件，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第二天誊正交学校油印[6]。通过这本讲义，中国学者第一次用现代学术眼光系统审视西方文学，在西学引进中夺回了本土学者的评判话语权。

（二）重构文学史观：鲁迅与《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1920年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学术等级体系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引车卖浆者流”的消遣，难登大雅之堂。将小说堂而皇之地引入最高学府的讲台并为其严肃修史，本身就是颠覆性的学术革命。新文化运动中白话小说被推向历史前台，但在学理层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面，小说的地位依然缺乏合法性支撑。鲁迅在序言中写道：“在中国‘小说自来无史’……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7]”经修订后于1923年由新潮社（北大内部学生社团）重印定名《中国小说史略》。通过大学讲坛与出版物的双重背书，鲁迅将传统考据学与现代文学演进观念相结合，确立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科学标准。

（三）学术表达的现代化：胡适、钱玄同与现代社科讲义

除了文学史的建构，自编讲义在推动新文学基础设施——白话文语体与现代学术规范方面，同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支撑作用。胡适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国人第一次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著作，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的标志。[8]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该书率先全面采用了现代新式标点符号，并以白话文进行分段排印。这一出版事件证明：白话文不仅能写浅显的通俗小说或新诗，同样能够胜任严密的学术论理功能。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是我国最早的汉语音韵学教科书，他将现代语言学思想和国际音标引入讲义，直接为新文化运动中如火如荼的“推行白话文”和“统一国音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工具与学术底气。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与北大心理学实验室相配合，开创了现代心理学。徐宝璜的《新闻学》开启中国新闻教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创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法。杨昌济的《西洋伦理学史》对现代伦理学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大学出版助力教科书的中国化与经典化

新式教科书的编纂最初是从翻译国外版本开始的，这种“知识舶来品”不可避免地带有脱离中国语境、丧失主体性的局限。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展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自觉，开启了教科书中国化的进程。这里的“中国化”，并非盲目排外，而是摆脱纯粹的“照搬照译”，吸收西方的学术规范，融入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进行自主重构。

以《欧洲文学史》为例，它不仅仅吸收了西方研究成果，还融入了周作人本人的思想观念，打破了西方主流文学史固有的“欧洲中心论”，特意增加了对弱小民族爱国作家、作品的介绍。[9] 这种视角的选取，深深刻上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寻求民族独立与救亡图存的时代烙印，确立了国人评价西方文学的本土坐标。以往有声音批评新文化精英主张“全盘西化”，这些自编讲义的出版是对盲目西化观点的最有力驳斥。

近代以来，在人文学科领域，西方视角曾长期占据解释世界的霸权。中国学者用自己编纂的教科书，努力夺回自我话语权。20世纪以前，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竟是俄罗斯人瓦西里耶夫编写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打破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李泰棻的《西洋大历史》，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无一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结晶。它们彻底终结了中国现代大学只能依赖外文教材的被动历史。

作为编者自身，讲义编写属于当时的教学任务，并无额外报酬。据周作人晚年记载的阅读记录，他自费借阅、购买了涵盖《希腊民俗与古宗教》《莎士比亚》《文艺思潮论》等数十种外文原典。[10] 这种毫无功利之心的呕心沥血，不仅折射了早期学者治学的纯粹，更凝聚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自主知识体系而付出的深沉期许与历史担当。

自编讲义的大规模出版开启了中国教科书的“本土化”与争夺学术话语权的征程。面对强势移植的外来理论，新文化学人将现代学术规范与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深度融合，不仅以科学方法重新审视了本土文化（确立小说史学、哲学史），更以中国人的主体视角重新解释了世界（重构欧洲文学史、西洋历史）。重温这段百年学术与出版交融的历史，对于今天我们深化新文科建设、摆脱学术依附、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依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镜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郝平 . 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39页 .

[2] 王学珍、郭建荣 .《同文馆归并大学堂谕》（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203页 .

[3] 王学珍、郭建荣 .《同文馆归并大学堂谕》（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94页 .

[4]《北京大学日刊》第719号，1920年10月18日 .

[5] 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书目"（选录）：《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2068—2070页 .

[6] 周作人 . 知堂回想录 . 上 M].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 .

[8] 王法周 .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的再认识——几个被学术界忽略的问题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9] 周作人 . 欧洲文学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18年 .

[10] 金鑫：《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2014年南开大学博士论文，第192页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